

第 十 章

陕甘宁边区的反摩擦

斗争形势和有利条件

在担负剿匪和河防斗争任务的同时，留守兵团的指战员们还要与边区内外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摩擦进行紧张的斗争。

摩擦与反摩擦的斗争，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斗争的特殊形式。这一斗争之所以不可避免，在于阶级矛盾存在的客观性。抗日战争时期的矛盾是错综复杂的。起主导作用的是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但是由于国民党主要领导集团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并没有完全放弃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决定了阶级矛盾依然存在，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表现还很尖锐。这就是反共顽固派制造摩擦的根源。反共摩擦既是不可避免，我党我军的反摩擦也势在必行。因为它不仅直接关系到边区的巩固和安全，也直接关系到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坚持，关系到

全民族抗战的根本方向，是一个原则性、政策性都十分强的问题。

对于抗日战争中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在我们党内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的。早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在确定动员一切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组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的同时，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我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同年十一月，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他又着重论述了这个问题。针对当时党内一度右倾思想抬头，出现了“何鸣事件”、“西救会事件”的惨痛教训，他号召全党都不要忘记陈独秀投降主义导致革命归于失败的血的教训，指出在统一战线中必须用一切努力去“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坚决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他的这些思想，后来就发展形成了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始终坚持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基本方针和策略。在这年年底，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从极“左”一下子跳到极右，在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专题演说，批评党的正确主张，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这以后，他还到处散布这一套错误理论。有

一天，王明在延安的一次并没有国民党人在场的群众大会上讲话，一口一个要“服从蒋委员长”，引起同志们的反感。有些同志边听边掰手指头计算，他这次讲话竟然喊了二十多个“蒋委员长”。不久，他到武汉工作，几次提出要把党中央搬到武汉，不主张建立农村根据地，不要独立自主的武装斗争。一九三八年九月，党中央通知他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听王稼祥同志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他不仅推故不参加，反而无理要求把六届六中全会搬到武汉去开。毛主席非常生气地说，我就坐镇清凉山，哪里也不去！这次全会认真清算了王明的右倾言论，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毛泽东同志在为会议作结论时，深刻地剖析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类错误口号的实质，明确提出：“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党内的这场争论当时对我的教育是很深刻的。它使我初步明确了我党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懂得了对国民党保持警惕，进行必要的斗争，不仅是自卫的需要，而且也是维护抗日统一战线的需要。一味退让、妥协，放弃原则，实际上就是放弃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就谈不上什么统一战线。有了这个认识，就为对付国民党顽固派在边区内外频繁制造的反共磨擦，作了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

实践证明，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是十分正确的。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在日军的诱降和英美劝降之下，本来就是被迫才与共产党合作抗战的国民党顽固派，逐步加紧了对各抗日根据地的限制、封锁以至武力进攻。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五中全会秘密通过《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不久又颁布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等一系列限制和迫害共产党的政策措施。从此，反共活动愈演愈烈，顽固派在各抗日根据地制造了无数次的磨擦事件和一次又一次的流血惨案。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领导各抗日根据地和全国人民实行抗战的大本营，又是八路军的总后方。对此，反共顽固派又恨又怕。八年抗战中，他们在边区内外制造的磨擦事件，几乎没有一天中断过。在他们掀起的三次反共高潮中，每次都把矛头指向陕甘宁边区，尤其是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更是把进攻陕甘宁边区作为他们反共的一个突出重点。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三八年底至一九四四年春，顽固派对边区发动武装进攻二百七十五次，抢劫骚扰四百五十七次，暗杀、诱逃、拘捕人员二百九十五次。由此可见当对顽固派制造的磨擦事件是多么频繁，边区的斗争形势又是何等紧张！

当对，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的南边、西边、北边驻有四十多万大军，计有十九个步兵军和两个骑兵军，还有地

方武装三个保安旅和十七个保安队。其中势力最雄厚也最顽固的是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的部队。这么庞大的兵力，不用于抗日，而是用来封锁和破坏边区建设。在边区境内各县，他们派驻有县长、县党部和保安队，在绥德地区派了一个专门制造磨擦的专员。此外，他们还派遣大批特务，潜藏在边区境内破坏捣乱。毛泽东同志在一份电文中曾经这样写道：“谋我者处心积虑，百计并施，点线工作布于内，武装摧毁发于外，造作谣言，则有千百件之情报，实行破坏，则有无数队之特工。”面对这种斗争形势，使我们产生了“山雨欲来”的强烈预感。

要应付这种严峻而复杂的局面，困难是不少的，例如，防线长，兵员少，武器弹药缺，河防和剿匪任务繁重，斗争经验缺乏，等等。但是，我们也有不少有利条件，除了有边区政府的密切配合和边区人民的支援以外，一个最优越的条件就是：我们是在党中央身边，斗争中遇到什么难题，随时可以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报告，得到最直接的指导和强有力的支持。

陕甘宁边区的整个反磨擦斗争，自始至终都是在党中央中，特别是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他对斗争情况了如指掌，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他善于把高度的原则性和必要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他善于从斗争实践中，及时发现和提出问题，及时归纳、总结经验，并及时提醒我们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许多重要的策略思想

和斗争原则，党中央、毛泽东同志虽然是随着斗争的发展到后来才陆续向全党提出来的，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开始就从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言传身教中贯彻了这些思想和原则的基本精神的。例如，“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在同顽固派斗争时，必须坚持自卫的原则，做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还要坚持胜利的、休战的原则，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既打击他们的反动政策，使其收敛，又尽量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内。这些策略思想和斗争原则，虽然都是到后来才见之于文字，但它的基本精神，却象一根红线那样，贯穿着陕甘宁边区反磨擦斗争的始终，指引我们处理了斗争中的大量问题。

当时，我是名正言顺的经国民党任命的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执掌陕甘宁边区的防务，所以，在处理陕甘宁边区的磨擦事件中，和国民党方面打交道的直接出面者是我，给国民党军政要员发电根交涉也大多是用我的名义。那些发给上至蒋介石、程潜、胡宗南，下至国民党的师长、专员、处长的电文，以及有关反磨擦斗争的声明、文章、布告等，基本上都是经过毛泽东同志亲自审阅、亲笔修改的，其中不少还是他亲自起草的。这使我有机会直接学习毛泽东同志伟大的战略策略思想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受到终身难忘的教益。我曾将这一百四十多份珍贵的文电手稿

装订成册，从延安带到东北，从东北带到湖南，从湖南又带来北京，在身边珍藏了三十多年。这三十多年中，这两册文稿跟随我经历了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也经历了十年内乱。一直到一九七六年四月，我才把这些文稿上送给毛泽东同志。我在同时附上的信中写道：“我在延安，在主席直接领导下工作八年之久，这是我一生革命经历中受主席教诲最经常、最深刻的一个时期”，“这两本文稿，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是重要的历史文献。我已七十有三，一旦由我失落，是无法弥补的损失。经过反复思忖，我决心把这两本文稿，敬呈主席，以尽心意。”现在，这些文稿在中共中央档案馆保存着。

南大门磨擦迭起

一九三九年，从年初开始，国民党顽固派便接二连三制造磨擦事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且不断升级。由开始的造谣生事，骚扰破坏，发展到攻城掠地，血腥屠杀，到这年年底前后达到了高潮。其中磨擦事件最多，斗争最尖锐、激烈、复杂的主要是关中、绥德、陇东三个地区。

关中及其毗邻的郿甘（郿县、甘泉）一带，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是全国各地进步青年和国际友人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一条主要通道。这个地区又正是蒋介石的嫡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所属部队的主要防区。胡宗

南在关中和陇东一带，部署了十二个步兵军、一个骑兵军另两个骑兵师、八个炮兵团，共约二十万人的兵力。特别是把他的骑兵二师、二十八师、预备三师以及保安旅等大量兵力，部署在紧靠我边区邠县、淳化、栒邑等县的洛川、邠县一线，直接威胁边区的安全。还有当时任陕西省主席的蒋鼎文，也是蒋介石的亲信。他委派到我邠县、栒邑、淳化等县的几个县长及其保安队，也都是内战内行、专门制造磨擦的大小爪牙。这样一来，这个地区的磨擦事件之多，在各个时期几乎都居首位。我至今记忆犹新的事有两件：一是武力攻占我栒邑县城，并惨杀我残废员兵；二是无故扣留并阴谋迫害我八路军护士、学生。

一九三九年初，因河防吃紧，我八路军原先设在黄河边上的残废院，奉命西移到关中地区栒邑县城南边的土桥镇。栒邑国民党县长张中堂及邠州国民党专员张明经闻讯后，竟然调集保安队二、三千人，围攻残废人员，迫使我残废院不得不退出土桥，移到栒邑县城。为此事，当时我曾电告蒋介石。蒋回电说：“已电陕西省府制止矣。”然而这只是一句应酬、搪塞的话。到了五月下旬，一天，残废院的一个采买人员出城采购，又突然遭到该县保安队枪杀。残废人员群情愤激，派出代表前往国民党县府请愿，县长张中堂竟然指挥保安队开枪射击，当场惨杀我残废代表九名，随后又率领大队人马向我留守兵团派驻县城的独立一营进攻。在这同时，张明经也调来保安队两个团，日夜猛

攻。众寡悬殊，我军被迫退出县城，柭邑遂被顽军占领。出城时，残废院有十七名重残员兵掉队，被保安队捕去，经毒打后，全部被杀害。

这些伤残人员在抗日战场上虎口余生，在抗日后方却死于“友军”之手。我们当时真是痛心极了，也愤慨极了！独立一营官兵纷纷要求增兵进行还击，夺回失地。从道理上说，事情是顽固派挑起来的，而且杀了人，夺了地，我们有十分充足的理由实行还击。但是，仔细一分析，给顽固派以武力还击，对我们并不利。一方面，我方当时兵力有限，大举增兵不可能，再打起来，还要吃更大的亏；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顽固派正巴不得我们动用武力，以便借机制造更大的磨擦事件。权衡利弊得失，党中失从维护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指示我要争取和平解决的前途。我们首先说服独一营官兵采取忍痛、克制态度，力持镇静，等待上级解决。随后，我给蒋鼎文发了急电，谴责了张明经、张中堂一伙制造这一杀人略地惨案的罪行，悲愤而又有克制地指出：“查敝军残废员兵，以抗敌余生，息养后方，前以移驻土桥，备受迫害，今又大遭屠杀，消息传来，痛心曷极！惟念国家处此危急存亡之际，袍泽之间，纵有差错，总宜容忍”。要求陕西省政府派员查处此案。毛泽东同志审阅了这份电文，要我同时致电蒋介石和程潜。此外我还就这一事件，向全国发了通电，要求各界“一致呼吁，以彰公理，而警凶顽”。国民党顽固派杀人理亏，蒋介石、蒋鼎

文等人自然不敢也不会派人来调查处理。在这件事上，我们虽然受了些损失，但也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揭露了顽固派破坏团结、惨杀抗日伤残员兵的罪行，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和声援。

一九三九年三月下旬，我八路军招收的护士学生二十七人，着装整齐，奉命由西安步行到延安学习。当他们走到靠近边区的中部县（即今黄陵县）时，竟被国民党县政府无故扣留，并于四月一日，派军警把他们强行押送到别处去。正好这一天，我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有几个同志乘车经过中部县，发现了这一情况。他们立即派人到县政府再三交涉，要求放人。这个县政府蛮横无理，一口拒绝。随后又在县府门前加派哨兵，不让我交涉人员进去。我得知这一情况后，首先致电蒋鼎文和中部县长，随后又致电蒋介石，严正指出：这种行为显系故意捣乱，事关抗战，希望命令陕西省府迅速予以释放。由于这件事情实在办得太蠢，蒋介石也不得不给我回电：“肖主任：中部县扣留贵部护士学生，已电蒋主席将转饬该县速予释放矣。”这批护士学生虽然被释放了，但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顽固派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那天如果不是正巧被我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同志路过时发现，这批护士学生还不知要被押往何处，遭受到什么样的磨难呢！

一连串事件发生后，我们从维护抗日统一战线这个大局出发，虽然每次都急电国民党的军政要员，要求制止事

态发展。但由于蒋介石的方针已定，当地顽军有恃无恐，磨擦事件不但得不到制止，而且形势越来越严重。柘邑几十名罹难烈士的血迹未干，驻洛川以马禄为师长的国民党新编骑兵第二师，又在频繁调动，向郿县开进，一部已进占郿县南部的几处村镇，这时我郿甘警备区司令部司令员是由兵团参谋长曹里怀兼任。他要处理整个兵团的许多事情，很难集中精力去应付郿甘一带的严重局势。警备区下面只有阎红彦为团长的警三团和陈先瑞为团长的警四团以及特务团等兵力，分布在很长的防线上。而郿县距离延安，不过百余里。一时形势很紧张。

为了确保边区南大门的安全，党中央指示我们要加强郿甘警备区，我们随即调文年生率领警八团开到了郿县一带，并任命文年生为郿甘警备区司令员，阎红彦为政委，陈先瑞仍任警备区副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仔细修改了我给马禄和洛川专员等人的电文，并在亲笔起草的一份致程潜、蒋鼎文的电稿中严正声明：如果马师强占不退，则引起冲突之责任及一切后果，我们概不负责。为了维持社会治安，稳定当地局势，毛泽东同志还先后两次起草和改写以郿甘警备区名义发布并在各村镇要道张贴的布告。他在布告中写道：“本军奉命镇慑，业已部署周详。外与友军团结，内与党改协商。唯期地方安静，即以巩固河防。倘有汉奸国贼，敢于以身试法。国家法纪所在，决不许其徜徉。”在这同时，我们还派代表去与马禄进行了说理斗争。

警八团到达酃甘前沿后，立即同原先在达一带驻防的部队一道，投入了紧张的战斗准备工作。大约也是在这期间，我来到了酃县及其附近的茶坊、交道镇等地。在这之前，我曾来过几次。达一次是专门来看工事的，同我一起从延安来的还有两位苏联军事顾问。我们走了不少地方，看到在一些交通要道和险要地段，都筑起了比较坚固的野战工事。指战员们对于顽军可能从哪里来，自己准备怎样应付，也能讲出个一二三四。看到和听到这些情况，我感到满意，对守住边区南大门心中有了数。果然，马禄见边区军民严阵以待，没敢轻举妄动，并回电说是“误会”，双方应以团结为重，互不侵犯，找了个下楼的梯子，乖乖地缩回去了。

正当马禄杀气腾腾，妄图挥师北上，从外部进犯边区的同时，国民党派驻酃县的县长蒋隆延在边区境内，也密锣紧鼓，兴风作浪。这个蒋隆延在酃县地区敲诈勒索，横征暴敛，一再加重民众负担，致使民怨沸腾，群情激愤。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大义乡人民群众忍无可忍，一起拥到县府请愿，搞得这位县长狼狈不堪。我当地政府为了团结他们共同抗日，派出代表帮助他们做工作，才将这些群众劝回。但这个蒋隆延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指令六个联保主任叛变为匪，率领匪徒在大义乡一带，切断交通，劫走我军来往人员数十名。随后，又组织暗杀队，埋伏险要，阴谋杀害我酃甘警备区领导干部及各团、营长，

制造恐怖气氛。一九四〇年一月八日晚上，我特务团参谋长匡裕民的警卫员从该地经过，暗杀队以为他就是匡参谋长，突然行刺，将他杀害。正巧被我特务团一位连长路过这里发现了。该团断然采取措施，立即派出部队缉拿凶犯，当场捕获凶手罗克勤，接着又捕获暗杀队的头目、中队长韩振江和分队长王子玉，并解除了这个暗杀队的武装。事后，我致电程潜、蒋鼎文等人，要求严厉惩办肇事者。《新中华报》在一版头条位置，以《酃县的大暗杀案》为题，发表社论，并以一个多版的篇幅，详细报道了事件的经过，对顽固份子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无情揭露和愤怒控诉。经过这一番斗争，当地的紧张局势才开始缓和下来。

边区境内怪现象的消除

陕甘宁边区境内各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同时存在着由我边区政府委派的县长、政府工作人员和由国民党省政府委派的县长、政府官员两套政权班子。在绥德地区，国民党陕西省政府还委派了一个行政督察专员。形成这种奇怪现象，有它的历史原因。有些县，例如绥德附近的米脂、吴堡、安定、清涧、延川、延长等县，原属我陕北老革命根据地。一九三六年红军东征抗日，国民党趁机侵占。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达成协议以后，这些县都划归边区政府管辖。但是，国民党原先委派的县长和政府官员，仍然把

政权紧紧抓在手里。另外一些县，原先不是老根据地，而是在“西安事变”前后，我们从东北军、西北军和其他一些国民党军队手中接防，后由国民党政府正式划归陕甘宁边区的。我军驻防以后，陆续建立了政府机构，但国民党政府原先委派的县长和政府官员仍然存在。各县的国民党县长大都组建了自己的保安队。

为了团结抗日，对于这种怪现象，我们一直采取忍让和克制的态度，允许他们暂时留在边区境内。开始，双方尚能相安无事，有事也能协商解决。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制造反共磨擦，这些披着“合法”外衣赖在边区境内不走的国民党官吏，便成了寻衅闹事的祸根。特别是国民党派驻绥德地区的专员何绍南，更是一个臭名昭著、群众切齿痛恨的反共磨擦专家。此人和侵华日军板垣师团长曾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两人交情甚笃。他又颇得蒋介石器重，政治上非常反动。当时，在绥德地区成立了一个“抗敌后援会绥德分会”的统一战线组织，为了争取和团结他抗日，分会主任由他担任，我绥德警备司令员陈奇涵只担任副主任。但是，何绍南当了主任以后，却以“确保地方治安”为名，调来保安队四百余名，又收买了一批兵痞、匪徒，合编成五个保安队，分驻各县，为他制造磨擦充当打手。

何绍南任职两年，制造了大量的磨擦事件。一九三九年五月，他授意安定县县长田杰生指挥保安队袭击我杨家

园子，用机枪扫射，打死打伤我官兵数十人。九月，他面喻吴堡县县长黄若霖，组织暗杀队，杀害了我718团三营副营长尹才生。十月，他指令清涧县县长艾善甫组织哥老会码头和黑军“政府”，并指使县府的官员串通土匪，到处抢劫，破坏社会治安。他还伪造八路军臂章及115师通行证，发给运输队的高步元等人，冒称八路军私贩烟土，毁坏我军声誉。他和他手下的一伙贪官污吏，到处敲诈勒索老百姓的钱财，光他自己贪污受贿的就有十万多元。当群众遭通灾荒时，他竟丧尽天良，侵吞了救济灾民的大量赈款。为了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开始，我们同他进行的斗争还是留有情面的。这个何绍南，不但不思悔改，反而认为我们软弱可欺，仍旧为非作歹，肆无忌惮。有一次，我听说何绍南路过延安，当即找上门去，毫不客气地教训了他一顿。我警告他说，我们八路军以团结抗战的大局为重，但决不是软弱可欺。如果你再这样扰乱后方，破坏团结，我们就不客气了。随后，我又引他去见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指着他的鼻子，斥责他是破坏抗战、制造磨擦的专家，并且声色俱厉地历数他的罪行，“骂”得他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头都抬不起来。虽然当时何绍南嗫嚅应允，但回去以后仍旧不断制造磨擦。一直到王震率三五九旅驻防绥德，并担任绥米葭吴清警备司令以后，针锋相对他同他进行坚决斗争，打掉了他的嚣张气焰，他才有所收敛。不久，他逃出陕北，到了西安。

为了把何绍南彻底赶走，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我联名致电蒋介石、孔祥熙（当时任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程潜、蒋鼎文等人，要求惩办何绍南，并委任王震兼任绥德地区专员（当时，陈奇涵已调离绥米地区）。电文中说：“现在组织暗杀之黄若霖，虽经撤职；纵兵为匪之艾善甫，虽被管押；贩卖烟土之高步元等，虽已法办……但发号施令之主谋罪魁何绍南至今逍遥法外，未闻议处。”对于如何处置该犯，毛泽东同志修改电文时，这样写道：请“将该犯官何绍南加以逮捕，并解至陕北，组织巡回法庭，令民众代表参加审判，置之重典，以肃法纪，而快人心。”对于委任王震为专员一事，经毛泽东同志修改后的电文是这样措词的：“查有绥米葭吴清警备区王司令震，前以转战华北，屡建奇勋，近则守备河防，复树劳绩，以之兼理专员一职，实属人地相宜。”

彭德怀同志在他的《自述》中曾经写道：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他从延安回太行山，路经西安时，在国民党西安天水行营主任程潜处见到过何绍南。彭总对程潜说，那些制造磨擦的“顽固分子，是秘密的汪精卫，比公开的汪精卫还坏”。当着程潜的面，彭总痛斥何绍南：“你就是这样汪精卫，在陕北做尽了坏事，破坏八路军的抗日后方。”临行时，他又警告何绍南说：“再去绥德当专员，老百姓抓了你公审！”但是，两个月后，这个反动透顶的何绍南，竟然又秘密潜回绥德，鬼鬼祟祟，继续煽动保安队袭击我河防

部队，先后打死我机枪连连长和哨兵多人。我派队缉拿，他呆不下去，便率领七个保安队哗变，逃窜到西北当土匪去了。

国民党派驻边区境内各县的县长，也是许多磨擦事件的制造者。前面提到的枸邑县县长张中堂、郿县县长蒋隆延，两手沾满了边区军民的鲜血。延安北边安定县（即今子长县）县长田杰生，也是一个罪行累累的恶棍。他是何绍南的一个重要帮凶。除了派队袭击并大量杀伤了我驻杨家园子的部队以外，一九三九年三月，由于边区政府处治了当地一个叫陈文才的积匪，他又借词寻衅，竟然将该县的我方县长薛兰斌拘捕起来，百般凌辱，并且调动保安队包围我瓦窑堡的驻军，袭扰我抗大分校。以后，他又纠集附近几个县的保安队数千人，断绝我交通，截夺我粮食，并修筑碉堡，将我驻军重重包围，不断向我开枪射击，打死我连长和战士多人。如果让田杰生以及张中堂、蒋隆延这一类所谓“县长”继续留在边区境内，边区就永远不得安宁。因此，在赶走何绍南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又决定：全部赶走这些专事磨擦的“县太爷”！

一九四〇年二月，毛泽东同志亲笔拟稿，以我的名义给程潜发了一份电报，要求通知陕西省政府迅速将边区境内国民党县长撤走。他在电文中愤慨地写道：“国共合作已历三年之久，这区行政尚未确定，一县而有两县长，古今中外，无此怪事。且陕省所派县长及绥德专员等专以制造

磨擦，扰乱后方为能事。在边区已忍让三年，在彼辈益肆无忌惮”，“边区民众群以拘捕治罪为请，劲光为体念钧座息事宁人意旨，顾全边区与陕省之团结起见，故请钧座令知陕省府自动撤回，否则实行护送出境，盖亦仁之至，义之尽也。”理直气壮，不容争辩。程潜回电，不得不同意边区各县县长得由边区政府委派。就这样，国民党派来制造磨擦的这些县长，便一个个离开了边区。既然他们同意离开，我们也就不念旧恶，以礼相待。他们离开时，有的地区开了欢送会，表示了我方希望两党以继续团结抗日为重的真诚愿望。唯有甘泉县那个姓杨的县长赖着不走，并且声言不论谁的命令，除非驻军将他拘捕或护送出境，否则，决不离开甘泉。他还造谣说遭到我方殴打。我方坚持斗争，寸步不让，最后他也灰溜溜地走了。

持续了三年多的奇怪现象，终于得以消除。边区境内从此平静多了！

陇东的曲折斗争

在陇东，当时也发生了许多磨擦事件。其中镇原、宁县两座县城之被武力侵占，是当时震动全国的重大事件。这一事件历时最长，斗争也最曲折，彻底暴露了顽固派妄图消灭边区的狰狞面目。为处理这一事件，毛泽东同志倾注了大量心血，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坚持斗争，又

顾全大局的伟大胸怀。

国民党派驻兰州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兼甘肃省主席朱绍良，当时对我党表面上保持着一副友好姿态，实际上却在推行许多反共、防共措施。他曾宣称，他们的敌人有两个，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一个就是共产党。他同蒋鼎文一样，是制造磨擦事件的幕后人物。面当急先锋的是国民党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钟党成。钟竟成的专署和保安司令部就设在紧靠我边区的西峰镇。西峰镇本朱是我们的防区，在留守兵团刚成立时，被国民党关麟征的165师抢占去了。我们为了坚持抗战，维护统一战线，对钟竟成策划的分裂团结、破坏抗战的行为，一再采取忍让和克制的态度。但这个钟竟成却一意孤行。他不仅公开谩骂共产党、八路军，指使报刊经常刊登诬蔑我党我军的文章和漫画，而且公然阻止我军购粮，摧残拥护我党的民众团体，阻挠我军募款，缴夺我军枪械，掳掠和杀害我军官兵，并亲自指挥他的保安队，勾结和配合国民党驻陇东的正规军165师、97师，对我留守陇东的770团等部，公开进行武装挑衅，制造了一起又一起流血惨案。他是陇东的又一个何绍南！

陇东发生的头一件较大的磨擦事件，就是在钟竟成的指使下干的。一九三九年二月底，国民党派驻合水县应子区的区长王永清，在阻挠我军购买粮食时，竟然收缴了我七团三营营部采买上土的武器。三月初，我三营派八连连长陈凤山去区公所交涉退还武器的事，王永清竟破口大骂

八路军是土匪，又收缴了陈连长的武器，并将他捆绑起来。该连士兵十余人闻讯往救，王永清又指挥保安队埋伏在城根下，突然开枪射击，并投掷手榴弹，击伤我战士四名。我方忍无可忍，断然将这个王永清捕获，带到营部审讯。问是谁叫他这么干的，他供认是“奉专员、县长的命令”。专员就是钟竟成。我给钟竟成打电报，指责他竟敢以和平为示弱，以忍让为可欺；同时也致电朱绍良，要求他切实查办此事。后来朱绍良以甘肃省府的名义，通过我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转来一封公函，反指责我捕获王永清是什么“军队干政”，要求“立即释放”。我在致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伍修权的复电中，叙述了事情的经过，要求伍修权严词拒绝对方的指责，并应指出“该王区长为现行军事犯，应由本军法庭依法处理”。

出动大军围攻镇原、宁县两座县城的事件，打头阵的也是这个专员钟竟成。这年四月中旬，钟竟成调动几个县的保安队九百多人，开到了镇原附近。随后，国民党的165师也派来两个营。他们与城内的保安队密谋，想以出城打野外为名，把城外的顽军引进来，里应外合，夹击我军。当时，我留守兵团三八五旅七七〇团的一个营驻防该城。这个营及时识破了对方的阴谋，闭城自卫。城外顽军攻城甚急，城内保安队数十人举行暴动。这个营迫不得已，就先解除了城内这几十人的武装。城外顽军围城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

在镇原我军被围的同时，国民党派驻宁县的县长，指挥事先纠集的保安队七、八百人，夜袭我军，砍杀哨兵，冲入我营区。驻守该城的我军仅三百余人，从梦寐中惊起自卫，将肇事者击退。我军伤亡惨重。对方继续增兵攻城，从此宁县也陷在顽军围困之中。

两处消息传来，我们气愤之余，迅速研究了对策。为了不使事态扩大，我在要求部队保持高度警惕的同时，分别致电蒋介石和朱绍良等人，说明真相，要求双方派代表调查处理。蒋介石回电说：“已电朱长官转饬严令制止。如某一方面再有捣乱或挑衅行为，引起冲突破坏抗战之事发生，应予严惩。”表面上不偏不倚，实际上是在推卸制造磨擦的罪责。朱绍良回电同意派代表谈判。

五月七日，我方代表王观澜同志与朱绍良派出的代表、参议员谭季纯，在庆阳驿马关作了初步商谈，约定停止军事行动。不料对方不但不履行协定，反面继续增兵，加修工事。直至七月一日双方代表再度协商后，才逐步恢复正常状态。

记得就在这前后，我曾带领参谋人员，到陇东去检查过工作。三天才到达385旅旅部所在地庆阳。当时王维舟任385旅旅长，甘渭汉任政治委员，耿飆任副旅长。我在陇东大约呆了个把月，除了向干部传达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一些指示，还到驿马关去和前面提到的那个国民党西峰专员钟竟成谈判过一次。驿马关是我770团团部的

驻地。我们到达后，团长张才千、政委肖元礼等向我反映了当时陇东一带反磨擦斗争的详细情况。我同钟竟成谈了一下午和一个晚上。我耐心地向他阐述了我党对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实行国共合作的立场和态度，指出友党友军之间闹磨擦，只能有利于日寇和汉奸，希望他以抗战大局为重，不要再干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这个在陇东干了大量坏事的钟竟成，在谈判桌上却尽说些冠冕堂皇的话。真是一个口蜜腹剑的家伙！在陇东，我还和一些旅团干部分析了当时的斗争形势，研究了对策。当时，有些同志就预见到，这种表面上的平静状态，是不会维持多久的。我方兵力有限，要固守每一座县城是难以办到的。必要时只有暂时忍痛，退出县城，占领广大农村。

果然，只过了两、三个月，在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提出将政治反共为主改为军事反共为主的方针后，当地顽军和钟竟成狼狈为奸，又挥舞起屠刀，放手大干了。

十二月十日，宁县国民党县长率保安队，在胡宗南部第九十七师一部的配合下，袭击我驻该县的一个营。他们在事先掘好的地道里埋藏地雷，突将地雷引爆，造成我军伤亡过半，营长也受了重伤。指战员们顽强抵抗了两昼夜，终因寡不敌众，突围出城，该城遂被顽军占领。

与此同时，合水县的保安队为配合宁县顽军的进攻，也向我驻该县的一个连袭击。经三小时激战，在我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顽军缴械投降，投有占到便宜。

十四日深夜，镇原县国民党县长率保安队四百多人，突然向我新驻进该城的七七〇团二营进行袭击。第二天早晨，国民党第九十七师五十八团步兵一个营、炮兵一个连，又发动进攻，用大炮猛烈轰击我军阵地。我二营英勇还击，打死顽军几十名；该营伤亡也较大，一些干部和老红军战士壮烈牺牲了。激战至十六日，二营在得到旅、团首长的批准后，于当天深夜，从事先挖好的一个城墙洞内，主动撤了出来。

几乎在这同一个时间，国民党顽团派还调动长武一线的三十五师、一六五师分头向我边区开进，并派飞机在镇原、宁县上空侦察。我八路军驻西峰办事处也被顽军包围，幸办事处人员事先察觉，采取对策，才得免于难。

顽固派在陇东制造的这些杀人略地的事件，与当时日军频繁进犯河防的军事行动遥相呼应，与前面谈到的顽固派在边区其他各地制造的磨擦活动，也是密切配合的。各地急报传来，当时我心头的愤慨真是达到了极点，恨不得立即采取反击措施。但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却很镇静，具体指导我们从维护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进行了坚决而有节制的斗争。

当时，用什么样的斗争方式，才最有效、也最切实际呢？从其他根据地增调大军，来夺回失地吗？不仅没有可能，相反还可能给顽固派大举进犯边区以借口，于边区，于团结抗战都不利。最有效的办法还是从政治上彻底揭露

顽固派的倒行逆施。

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战开始了。除了以我的名义连续给朱绍良发了许多份急电，几次给蒋介石、孔祥熙、陈诚、白崇禧、程潜等一大批国民党高级军政要员发出通电以外，报纸、电台更是大声疾呼，同声谴责。八路军驻重庆、西安、兰州等地办事处的同志，也四出奔走呼吁。通过这些办法，使全国人民很快知道了顽固派在陇东干出了什么亲痛仇快的罪恶勾当，也迫使国民党感受到巨大的政治压力。

这里，我要回顾一下毛泽东同志在这场斗争中是怎样字斟句酌地为我修改电文的。从他修政和亲笔起草的电文中，可以看出当时党中央关于反磨擦斗争的一些重要的策略思想。

毛泽东同志在修改电文时，多次加了这样一些话：“边区二十三县范围为蒋委员长所指定”，我军“对于原定二十三县并未越出雷池一步”。这样写理由很充分。边区二十三县是你老蒋亲口承认，又经过国民党的正式会议讨论才决定下来的。现在你又派兵来侵占，出尔反尔，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

在修改我给蒋介石等人的一份逆电中，毛泽东同志反复推敲，最后改写成这样一段话：“目前日寇以一师团之众大举西犯，柳林、军渡相继失守，我河防部队正尽一切力量，予以痛击，连日战斗甚为激烈。大敌当前，覆舟堪惧，

后方纷争，实属不宜再有。苟一方拚死杀敌于前，他方复乘机争夺于后，则不啻以刃资敌，前途危险，何堪设想！？”这段话里的潜台词，是在警告顽固派不要继续与日伪勾结。

在修改我致程潜、朱绍良的一份电文时，毛泽东同志加了“据闻一切行动均系根据新颁处理共党问题方案，下级不过照此方案执行而已”一句，点明下面的人制造磨擦，上面是有“根”的。

毛泽东同志还在以我名义致程潜的一份电文中写道：“镇宁两城虽被袭占，无辜官兵里被牺牲，下级人员虽极愤慨，然劲光至今未增一兵，无非体钧座之意旨，本团结之大义，力求和平解决之道。”“职意公平处理，撤兵为先，进占镇宁两城之兵不撤，即无以示诚意而服人心。专员钟竟成实为肇祸之主谋，庆父不去，鲁难未已，施以撤惩，出自钧裁。”义正词严，字里行间，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以大局为重，忍让为怀和原则问题决不含糊的坚定立场。

在朱绍良答应派员调查后，毛泽东同志又认真细致地修改了我的覆电，把原稿的语气改得比较级和，并在旁边提示我：“此稿原文措词太激，甚不相宜，故改正如此。”认真琢磨他修改的词句，对于怎样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策略，我心中就更有数了。

经过一番交涉、斗争，朱绍良派了保安处参谋长李学模作代表，我方则派谢觉哉同志为代表。谢老德高望重，

当时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在这以前，他作为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代表，曾在兰州领导八路军办事处先后有两年多时间，跟朱绍良等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都很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选派他来作谈判代表，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对于如何进行谈判，毛泽东同志专门给谢老写了一信，由我转交给他。信的内容如下：

“谢老：谈判条件（甲）陇东六县（环县，庆阳，合水，宁县，正宁，镇原）属边区二十三县范围，地方行政应即全部移交边区管辖，杜绝一切纠纷之源；（乙）边区及八路军保障不向六县境外越出一步；（丙）在上列两条基本原则下具体解决彼方从六县撤退军队保安队行政机关及此次纠纷中双方交换俘虏等事；（丁）如彼方不愿照此解决，则我只能承认双方停止冲突，暂维现状，交换俘虏，其他问题，由双方中央解决。”

谈判地点是在陇东西峰镇。谈判从一九三九年底开始，持续到翌年二月间。由于对方无诚意，协商不可能取得积极成果。最后还是象毛泽东同志信中最后一条所说的，双方代表只达成了一个“暂维现状，听候双方中央解决”的协议。

这一年，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兴风作浪的同时，还在湖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平江惨案，在河北有张荫梧事件，山东有秦启荣之进攻，河南有确山县之流血。年底以强占我镇原、宁县两城，在陕西方面又扬言要进攻延安为标志，

掀起了国共二次合作以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为了击退这股逆流，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第115师师长林彪，第120师师长贺龙，第129师师长刘伯承，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高岗，第十八集团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联名向全国发表了一份反对枪口对内，进攻边区的通电。通电中痛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悲愤填膺地大声呼吁：“夫共产党则亦何负于国，何损于民？深入敌后流血苦战者，非共产党领导之八路军新四军乎？力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者，非共产党之一切党员乎？以边区论，共产党几曾越过二十三县以外之寸土尺地乎？攻枸邑，夺宁县，占镇原，而执行其所谓‘消灭边区’‘打倒共产党’之任务者，究何人乎？大好河山，半沦敌手，而唯此边区二十三县是争，清夜扪心，能不为之汗颜乎？”通电要求全国军政领袖与各界人士主持公道，“痛国亡之无日，念团结之重要”；要求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惩办肇事祸首，取缔反共邪说，明令取消防制界党活动办法及处置共产党实施方案，制止军事行动，勿使局部事件日益扩大”。通电发出后，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顽固分子跃跃欲试，疯狂叫嚣要“消灭边区”的言行，也不得不有所收敛。这样，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终于被击退了。

和邓宝珊将军的交往

抗日战争期间，统一战线中的各阶级、各阶层的政治态度是不尽相同的，有进步势力、中间势力和顽固势力。对于顽固派，要针锋相对，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而对于中间势力，例如对那些地方实力派，那些愿意同我们固结抗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毛泽东同志历来的主张是要采取团结争取的政策。在延安的一些重要会议上，他反复阐明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还常对我说，只要双方赞成抗日，对我友好，我们对他就要以诚相见，以礼相待。这里，我要着重回顾一下当时我们同邓宝珊将军友好相处的一些往事。在这件事上，毛泽东同志不仅给了我许多指示，而且亲自做工作，为我们团结争取友好人士树立了典范。

邓宝珊先生是甘肃省天水市人，早年加入过同盟会。他和我党许多早期从事革命的同志，如李大钊、刘伯坚等有深厚的交往。他在兰州任国民党新编策一军军长的时候，经过我党当时派驻兰州的代表谢觉哉和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同志的努力，同我党建立了十分友好的关系。他曾利用自己的地位，保护过我们的同志，并将他的女儿送来延安学习，参加了革命。抗日战争期间，他的部队在榆林地区驻防，对于支撑北线抗日，维护边区的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了沟通联络，协防抗日，他在我边区绥米葭吴清

警备司令部的驻地绥德设立了办事处，并指示所属部队要“维护边区到榆林的交通安全，保护来往人员和物资的顺利出入”。

一九三八年五月的一天，毛泽东同志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是据延安市负责同志向他报告，邓宝珊一行数人，路过延安，住在南关附近的一家骡马大店里，市里的同志邀请他住招待所，他一再谢绝。毛主席要我同他一道到骡马大店去看望邓先生。我一听，喜出望外。因为我要经常同边区周围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将领打交道，对邓宝珊其人，我虽然久闻大名，但是并没见过面。有机会同他结识，对边区今后的防务将是大有好处的。毛泽东同志要我随他一起去看望，也正是考虑到工作的需要。我们走进骡马大店的院子时，邓宝珊闻讯迅速迎了出来。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满面笑容，同毛主席一见如故，谈得很融洽。随后，毛泽东同志在交际处摆了几桌酒席，请他吃饭。出席作陪的除我以外，还有李富春、周小舟等同志。毛泽东同志挽留他多住几天，到各处走走、看看，对边区建设多提宝贵意见。他很受感动，欣然改变了原先打算第二天就启程的计划，在延安逗留了有个把星期。这一次相识以后，他到西安、重庆等地开会，途经延安时，几乎每次我都陪他去会见毛泽东等同志。

一九三九年四月，他由某集团军副总司令改任晋院绥边区总司令。我给他打了一份电报，表示祝贺。电文一开

头就写道：“兹值敌寇亟图西犯之际，晋陕绥边区，实为西北门户，将军能一韬虎略，声威早著，今公坐镇三疆，敌胆定寒。展宏猷而建奇勋，逐胡马而奔汉北，可预期也。”给了他以很高的评价，并寄予巨大期望，表示双方应更加团结一致，共同反击日寇的侵略。

同年五月六日，他又路过延安，下榻交际处。当晚，边区政府和留守兵团联合为他举行了欢迎晚会。他在晚会上讲了话，除了赞扬边区人民的吃苦耐劳精神，感谢边区政府对他的热情接待以外，还就加强团结讲了这样一段话：

“我民族之前途有二：一存，一亡，欲存则全体应加强团结，因为只有团结，才是抗战胜利的基础。要团结则大家都要说实话，彼此有不好的地方，要坦白的进行批评，要尽量设法消灭一切不必要的磨擦，这才是加强抗战力量的办法！”几句真诚的话，博得了全场一千多人的热烈掌声。

六、七月间，我到绥米一带河防部队检查战备工作时，也到他设在榆林的总司令部去拜会过他，受到他的热情款待。记得当时同我一起去的还有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教授。李教授是曾被国民党政府非法逮捕迫害过的全国闻名的“七君子”之一，后来在解放战争初期又因争取和平民主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昆明街头。那年他是专程到榆林去看望邓宝珊将军的，路过延安时，与我结伴而行。交谈中，邓宝珊将军流露出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很不满，西对我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陕甘宁边区建

设，表示拥护和赞赏。我对他能够坚持抗日，坚持和我党我军友好的态度，也说了一些赞扬和表示感谢的话。双方都同意团结对敌，遇事多商量，互相体谅，友好相处。

邓宝珊手下当时驻榆林地区的还有国民党第二十二军军长高双成（立卿），兵力比较单薄，对我方也比较友好。到榆林时，我也去拜访过他。

由于有这样两位友好的高级将领，陕甘宁边区北部地区的磨擦事件，相对来说，就少得多。有时，个别下级军官不大讲理，与我军发生了一些纠纷，也比较容易解决。例如，一九三九年冬天，邓宝珊所属的新十一旅第一团第三营一个姓宋的营长，率领士兵强占我驻定边县城的警二团所属骑兵营的三处营房，致起冲突。双方开枪打了起来，各有伤亡。我骑兵营追到宋营营房内，并收缴了对方一部分枪枝。两军对峙，剑拔弩张，各不相让，如不抓紧处理，很可能酿成一起极其严重的事件。

闻讯后，我立即致电邓宝珊，极据警二团的报告，向他通报了事件发生的经过。电文的最后有这样几句话：“恳请速电制止，将该营另调他处，以平公愤，并将敲诈人民、贪脏枉法、破坏团结、制造分裂、肇事凶犯之宋营长撤职严办，以惩刁顽，而维法纪”。毛泽东同志审阅电稿时，将这段话全部划掉，改写成：“事件发生谅系宋营长受人挑拨所致。现在事态颇为严重，敬恳我公速电制止该营长，勿再寻衅，然后查明事实，合理处置，并可否将该营另调他处”。

他还在电稿的旁边加注提醒我：“肖：后面口气太硬不好”。平常，对于邓宝珊，我还是把他同国民党的其他将领区别对待的；定边事件发生后，我正在气头上，对口气这样生硬的话都没有改动。直到毛泽东同志的提醒，我才认识到自己的粗心和意气用事。从这件事上，也反映出我对于毛泽东同志经常讲要努力争取中间势力，不同对象要区别对待等指示，还理解不深。如果毛泽东同志不把最后那些指责和带命令口气的话，改得比较缓和，邓宝珊先生看了，很可能要勃然动怒，至少是心里会不高兴，定边事件的处理，就可能节外生枝，迁延时日。

事态的发展，完全证明了只有象毛泽东同志这样，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才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效办法。邓宝珊收到我的电报后，果然态度很友好，回电主张和平解决，并建议双方立即派代表到当地去查明处理。我方派贺晋年为代表，到这定边后，会见了邓宝珊派出的代表王参谋和当地驻军陈团长、徐县长等人。对方态度友好，召开了欢迎大会，并承认事情的发生，首先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部队军纪败坏，领导无方，预先不通知，就占驻我营房造成的，表示要将宋营长调防，希望双方友好相处。贺晋年同志经过调查了解，事件确实是由于对方个别下级军官的不友好行为所引起，而不是来自上面有意制造的磨擦事件。现在双方意见基本一致，只是在“谁先开的第一枪”等个别问题上，各执一词，事情发生在黑夜，一时也难以

查清。对方态度好，我们就更加严格要求自己的部队，将所收缴的对方的枪枝和其他物品，如数送还。同时要求部队认真总结一下这次事件的经验教训，看看以后处理类似事件，不用武装冲突，是否还有别的和平解决的办法。我在发给驻定边部队领导同志的一份电文中，陈述了这些意见。毛泽东同志在审阅这份电稿时批示：“很好，照发。”后来，我把贺晋年调查处理这一事件的详细情况，如实向邓宝珊作了通报，并对他能够秉公处理，不使事态扩大的公正立场表示赞赏和感谢。毛泽东同志审阅时又作了批示，要我把这份电报迅速发给邓宝珊，很快了结这一事件。就这样，在毛泽东同志的具体指导下，一场风波迅速平静下来了。当国民党西安天水行营来电很来，要我报告定边事件的发生和处理经过时，我在回电中只用了“现已合理解决，和好如初”等几句简单的话，就算作了交代。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以后

从一九三九年底到一九四〇年初，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们胜利地打退了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并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一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将抗日战争以来各个根据地坚持统一战线，进行反磨擦斗争实践进行总结归纳，从理论

上透彻地阐述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以及“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等党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思想。我们这些亲身参加了反磨擦斗争实践的同志，听了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倍感亲切，也十分心悦诚服。这些政策和策略思想，对于以后指导各抗日根据地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的团结和斗争问题，起了重大的作用。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以后，陕甘宁边区的磨擦和反磨擦的斗争并没有止熄。然而，有了党中央制定的政策和策略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亲自指导，在以后的斗争中我们更感到得心应手了。

一九四〇年春，党中央派我和王若飞同志一起去秋林镇与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进行谈判。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军进占太原以后，阎锡山率领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后来连同他的大本营一起撤过黄河，到了秋林镇安营扎寨。他在这里坐镇指挥，不积极抗日，却挥舞起屠刀，指挥部队杀向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正当各地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紧急关头，他也密锣紧鼓，制造了“晋西事变”，集中两个军又四个师的兵力，企图消灭我决死队。我军英勇反击，于翌年二月底，全部肃清了晋西北地区的顽军，给了阎锡山以迎头痛击，在这种情况下，我党又主动建议谈判，他被迫同意了。

离开延安时，毛主席交给我们一封政阎锡山的亲笔信，

并对我们说，你俩去给阎锡山讲清楚，我们共产党是诚心实意要同国民党合作抗日嘛，你们为什么要同室操戈，制造磨擦，杀人略地，让日本强盗高兴呢？抗战初期，你阎锡山同我们合作得还可以嘛，为什么现在又跟着蒋介石的指挥棒转，同我们过不去呢？我们也不是好惹的，请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们到达秋林镇时，开始阎锡山自己不露面，却派了一伙人来纠缠、围攻我们。有的自称是新闻记者，但到底是些什么人，一时哪里搞得清楚！他们用挑衅的口吻，向我们提出一连串问题，要我们回答。这显然是在有意刁难我们。对于一些不怀好意的发问，我们根据事实，严词予以驳斥；对于那些不便明说的问題，我们也只好使用外交辞令“无可奉告”。我们坚持要与阎“长官”面谈，面交毛主席的亲笔信。这样，阎锡山才不得不出来见我们。这位在山西称王称霸几十年的军阀，这时候已经是老气横秋、步履艰难了。他在阅读毛泽东同志的亲笔信时，神情显得非常紧张。毛泽东同志在信中写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四句话。他提出能否把最后一句改一下，改成“我必自卫”。在原则问题上，我们当然不会轻易让步。事后，当我们回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时，毛泽东同志斩钉截铁地说：一个字也不能改，就是要坚持“人不犯我，我必犯人”！这次谈判，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果。我们把毛主席交代的那些话，都对他说，严肃地批评了他

制造“晋西事变”的罪恶行径。经过谈判，他接受了我党主张，达成了不再进攻我八路军防地和陕甘宁边区的君子协定，同意双方继续派代表具体协商联合抗日和划分防区的细节问题。随后，双方代表经过多次谈判，确定在山西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南与晋西北的分界线，晋西南为阎军活动区域，晋西北为八路军活动区域。这些协议，减少了磨擦，对于当时的团结抗日，对于边区的巩固，都是有利的。在这以后，阎锡山的反共活动收敛了不少，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在第二、第三次反共高潮中，阎锡山又成了中间势力。

一九四〇年三、四月间，国民党第九十军突然在黄河东岸、山西境内的大宁、蒲县一带集中。陕北人民纷纷揣测，有的说是该军将开至中阳、石接一带，以便偷渡黄河，袭取我边区绥德地区；有的说是该军即将从大宁、永和渡河进攻边区。我们得到的情报也证明，对方不怀好意。大军压境，一触即发，形势非常紧张。当我们正在商量对策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以“八路军河防兵团政治部”的名义，亲自起草了《八路军致友军九十军书》。他在这封公开信中写道：“贵军乃抗日军队，其任务应为抗日，而绝不应是进攻边区。敝军担任河防，与日寇隔河对战，久历时日，虽无奇功，幸告无过，亟愿与贵军团结一致，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共歼敌伪，复兴我中华民族，绝不愿与贵军及任何友军进行内战。盖当此之时，凡枪口对内者，为民族罪

人，国人绝不同情，贵我两军均是明白的。”信的最后，与对方约法三章，建议双方互派联络人员，互相交换抗日情报，友好相处。文稿起草后，毛泽东同志给我写了一封短信，告我如何散发这封公开信。信中没讲什么道理，但从中可以看出他考虑问题的周密细致，看出他指导反磨擦斗争是何等具体，使我深受教育。下面便是这封信的全文：

肖主任：（一）此件即铅印500份。（二）印出后以一份邮寄山西蒲县九十军李军长；以三份分寄山西蒲县探投九十军61师，53师，109师师长，以一份寄延安国民党县党部，以50份寄酆县嘱于（注：可能系“其”字的笔误）散发于向洛川行走之商人及酆县商人，以200份寄两延河防部队，嘱其分送吉县，大宁，永和之面人农民晋军及大宁一带之中央军，以20份寄秋林王英英嘱其散发，以一份交新中华报登报并发广播，以一份交我，其余概寄王震散发于警备区及分寄石楼中阳一带。速办为要！

毛泽东

四月一日

公开信散发并登报、广播后，黄河两岸，边区内外，一传十，十传百，“九十军要进攻边区了”的信息，不胫而走。顽固派当时的心理状态是：想反共，但又害怕别人公开指责他反共；不想抗日，但又还害怕丢掉抗日的旗号。

毛泽东同志写这封公开信，正是抓住了对方的这个要害，用造成强大舆论的办法给对方施加压力。这样一来，我们占了主动，九十军不能不有所顾忌，没敢轻举妄动。一场眼看要发生的重大磨擦事件避免了！

国民党的新十一旅一直驻防在三边地区。他们与当地我军长期相安无事。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具体时间记不确切了），我方突然得到情报，说是国民党的新二十六师何文鼎部被调南下，准备进攻边区。具体步骤是：该部先攻占边区的安边县，再攻占定边、盐池，然后配合南边从关中北上的军队，南北夹击，会攻延安。显然，反共顽固派在酝酿着一个大的阴谋。为了及时制止事态的发展，我们又开展了一次强大的宣传攻势。一方面向边区军民广泛揭露顽军的阴谋，动员大家提高警惕，严阵以待；一方面给朱绍良、傅作义、邓宝珊、高双成、胡宗南、蒋鼎文等人，连续发了十多份电报，大声疾呼，有的电报是用“万万火急”的特急电发出的。毛泽东同志在修改电文时，反复强调这样几点：一是指出这一阴谋如果付诸实施，“则不独三边糜烂势难避免，即国共关系亦难保不受严重之影响”；二是指出“三边地方安谧，无增兵之必要，粮草奇缺，无驻大军之可能，逆而行之，必有后患”；三是严正声明，“如何师不惜决裂，则敝部唯有坚持自卫立场”。

鉴于形势严重，在展开宣传攻势的同时，毛泽东同志指示我，迅速把一支实力相当雄厚的部队调到了三边一带，

加强了与对方抗衡的力量，并在致对方的电报中公开申明：何师无故南下，我军不得不防，这部分兵力调动，完全是为了自卫。如何师停止南下，我部也一定报快返防。对方见无机可乘，又自感理亏，加上邓宝珊、高双成等从中斡旋，又一次危及整个边区安全的阴谋被粉碎了！

尽管如此，在有的地方，顽固分子的某些阴谋还是暂时得逞。如关中的店头镇和淳化县城都是在这之后相继被顽军攻占的。

在发动武装进攻的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也在拼命制造舆论，企图把破坏团结、分裂抗日统一战线的罪责加在我党我军身上。一九四〇年二月国民党天水行营政治部编印了一本《中共不法行为及破坏抗战事实纪要》的小册子，完全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胡说什么磨擦事件是由于我党我军的“不法行为”引起的。为了揭破顽固派的欺骗宣传，让各界人民明了事实真相，毛泽东、王稼祥同志等决定，针锋相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于同年四月，以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的名义，将当时我们已经获得的六个国民党党内文件，集印成一本小册子，公开发行。这六个国民党文件是：《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异党问题处置办法》、《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小册子的书名是《磨擦从何而来》，书的扉页写了一篇《引言》，其中写道：“磨

擦之发生，非偶然之事件，而有正式文件为之指导，已为事实所证明”。“本书所刊用之《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文件，即系最好之说明。”“我们发表此等事实材料之目的，不仅为将社会人士所关心之磨擦问题的真相披露，且为希望颁发此等文件和发动此等事件之有关方面，为民族国家利益打算，以抗战团结为重，正式取消此等文件，认真制止此类事件”。事实最有说服力。这本小册子一发行，各界人士恍然大悟，疑团顿释；反共顽固派则气急败坏，手忙脚乱，狼狈不堪。

一九四〇年夏天以后，陕甘宁边区周围稍微平静了几个月。当时许多同志真诚地希望国民党当局会从此改弦易辙，以民族解放事业为重，不再干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事。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暂时的平静掩盖着一场新的更大的风暴。从这年九月开始，顽固派构筑包围边区的碉堡封锁线，历时八、九个月，才大体完工。这条封锁线，西起宁夏，南沿泾水，北接长城，东迄河滨，绵亘数省，其规模之宏大，有类万里长城；而其纵深宽度，且凌驾于当时驰名全球的马奇诺防线之上。封锁线分为五道，每道之间相距微十里，整个封锁线的纵深达百里以上。每道封锁线由一个接一个的碉堡群所组成，每个碉堡群，有一至二个母堡，还有许多个子堡。碉堡群多构筑于可通行之道路、开阔地或制高点。每座碉堡大的可容一连人，小的也可容一排人。碉堡的形状有圆的、四方的、六角的、八角的，

有二层、三层的。每座碉堡的周围有一道道散兵壕、外壕和鹿砦。各个碉堡群之间，有战沟相通。这种战沟宽约丈余，车马可通。其工程之大，并不亚于碉堡本身。碉堡纵横交错，密如蛛网。例如洛川至中部县相距不过八十里，第一道封锁线的碉堡就有五百一十八座之多。以后的实践证明，这大规模的构筑封锁线是顽固派的一种新的磨擦方式，是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利用这条封锁线，在军事上加强警戒，阻挠行人道过，发现边区工作人员外出，不是捕捉，便是射击；在经济上对边区进行封锁，禁止一切物品进入边区。对于一般商人、脚户，也不放过。除了公开扣留、没收其人畜、财物以外，还纵容兵匪沿途抢劫，以至行人裹足，交通断绝。但是，顽固派构筑的这一个个碉堡群，终究无法阻挡住历史前进的步伐，相反，倒成了他们反共反人民的罪证！

在加紧构筑碉堡封锁线的同时，反共顽固派对边区的武装进攻，也并没有停止。仅一九四〇年十一月，驻关中地区的国民党预三师等部，就向边区境内发动了七、八次进攻，强占了近二十个村锁。我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到严重损失的消息传来以后，他们更加得意忘形，气焰嚣张。洛川的国民党军政当局，竟在我边区大门口召开军民大会，庆祝他们血腥屠杀我新四军官兵的“伟大胜利”。有位军长召集联保主任训话时，毫不加掩饰地叫嚣：“宁亡于日，不亡于共。”“皖南事变”的硝烟未散，国民党109师的

327 团，便配合保安二旅等部，于这年一月底二月初，先后两次发起进攻，强占了我酃县的姚渠等地。

据当时统计，在大约三年的时间内，顽固派通过发动两次反共高潮，先后侵占了我镇原等四座县城和为数不少的村镇，打死打伤我军八百余人，给边区军民带来了严重损失。但是，在边区军民的英勇反击下，顽固派不仅在政治上丧失了全国的民心，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在军事上也没有占到多少便宜。边区军民共消灭顽军二千余人，缴获枪枝三千四百余支。特别是经过反磨擦斗争，我军官兵经受了锻炼，斗志更加旺盛。而顽军内部矛盾重重，那些反共头目成天在琢磨怎样制造更多的磨擦事件；下级官兵则害怕我军反击，一有动静就心惊肉跳，有的部队甚至到了“风声鹤唳”的地步。当时发生了这样一件有趣的事：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国民党六十一师驻左家镇的一个营，正在边界线上加紧构筑碉堡工事，并对边区军民实行严密警戒、封锁。一天晚上，当地村民有四头牛，从野外自行回家。该营警戒哨听到牛奔跑的声音，误以为是我骑兵迫近。当即发问：“口令！”并大喝“站住！”牛哪里听得懂，继续奔跑。哨兵便断定是八路军骑兵夜袭，一面报告营部，一面进入阵地，开枪射击。当场击毙牛两头，其余两头受惊突奔。该营竟认为是骑兵冲锋，一而后撤，一而调集援军。附近的保安队也急忙撤到了一座山上。师部闻讯后，不问青红皂白，连夜将我派驻秋林镇联络处的人员、

电台一并拘押、收缴，并给我打电报责问我军为什么夜袭友军，我回电说明并无袭击事情。开始对方还不相信，第二天经过调查，才弄清原来是四头牛引起的一场虚惊。对方这才将我联络处人员、电台送回，并赔偿了牛主数十元。这件事，在边区内外，一时传为笑谈。

一九四〇年底，毛泽东同志写了《论政策》的党内指示，全面论述了党的统一战线的政策，指出，“在目前反共高潮的形势下，我们的政策有决定的意义”，“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在毛泽东同志政策和策略思想的指引下，一九四一年五月，留守兵团对于反磨擦斗争的得失和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使全体干部结合斗争实践，受到一次生动的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思想的教育。与此同时，我还写了一篇文章，揭露了两年多来国民党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制造的磨擦事件，译成外文，向全世界人民披露事实真相，以驳斥顽固派的造谣中伤。文章的题目是《谈陕甘宁边区的形势》。全文约四千字，在比较全面地叙述和分析了边区周围顽固分子在各个时期制造磨擦的主要方式、特点和一些重大事件以后，还严正申明：如果顽固派继续执迷不悟，挑起事端，我方只有被迫自卫。毛泽东、张闻天同志等审阅和认真修改了这篇文章。毛泽东同志把文章后面的一段话，即“那末，我们必然以武装力量，配合饱经斗争的有组织的民

众，给他们（指顽固派）以应有的教训，我们完全有把握和他们作持久的斗争，并予以有力的回击”，改写成：“那末，也没有别的法子可想，唯有准备自卫，予进攻者以坚决的反击。但这完全是不得已的，只要反共派稍有觉悟，我们仍准备同他们言归于好。”这样一改，语气既坚决，又很策略。看完全文，毛泽东同志觉得言犹未尽，又增写了这样一段话：“劲光留守后方，责任重大，为使前线战士安心抗战起见，对于反共派捣乱后方之行为，不能不采取自卫步骤，用以保护后方之安全。反共分子的内战计划，将丧失全国的人心，我相信，他们的计划是必然要失败的。”文章经余光生同志译成英文发表，并对外广播了。

一九四一年夏季以后，在一年多的时间内，陕甘宁边区周围虽然再没有发生重大的军事冲突，但是，小的磨擦事件却仍然到处发生。到了一九四三年五月，形势又急转直下，国民党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狂叫“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调集了六十万大军，准备分九路闪击延安；同时准备对华北、华中八路军、新四军发动进攻，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党中央、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边区军民，运用各种方式，对国民党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同时抽调部队，大大增强了边区的防御力量，终于迫使顽军改变了大规模进攻边区的计划。这时，我虽然还在延安，也参予了一些工作，但由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已经成立，按照联司首长分工，对于反磨擦斗争，我已经不负主要责

任，详细情况就不赘述了。

回顾当年陕甘宁边区反磨擦斗争的全过程，我最深切的一条体会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毛泽东同志的这句名言，深刻地揭示了政策和策略的极端重要性。的确，在那样复杂、尖锐的斗争中，如果没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一整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进行指导，这场斗争会是怎样的结果，是很难设想的。就当年陕甘宁边区反磨擦斗争的情况来说，在统一战线中坚持党的政策和策略，我体会较深的是要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

一是反对顽固势力和争取中间势力。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对于这两种势力，不加分析，同等看待，那就只能壮大顽固势力，削弱抗战力量，不但不可能打击顽固势力反动的一面，争取他们留在统一战线内，而且还可能把中间势力推向顽固势力的营垒中去，因为顽固势力也在极力争取他们。当年我们对于边区内外象胡宗南、蒋鼎文、朱绍良、阎锡山以及何绍南、钟竟成、蒋隆延、张中堂这些大小顽固派制造磨擦的倒行逆施，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斗争。其中对何绍南这个死不悔改的反共磨擦专家，斗争更加坚决，终于迫使他无法继续呆在边区境内。这就不但严厉警告了边区境内那一大批国民党县长、保安队长等官吏，对那些地位很高的顽固分子也有所震动。面对邓宝珊以至程潜、高双成这些对我友好或在某些问题上还能持中间态度的国民党将领，我们则采取了积极争取的政策。

尤其是对邓宝珊将军，不但我们做工作，毛泽东同志还亲自做了大量工作。邓宝珊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能够一直同我们和睦相处，固然同他具有强烈的抗日热情有关，但也显示了党的政策的巨大威力。当时，边区东边有日军骚扰，南边、西边有几十万顽军频繁制造磨擦，如果争取他的工作做得不好，他在北边也给我们制造麻烦。那么，我们同顽固派的斗争，就不知还要困难多少倍！

二是团结和斗争。又团结，又斗争。团结抗战是目的，斗争是手段。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述，深刻地揭示了团结和斗争的辩证关系，两者缺一不可。开始，有的同志把两者对立起来，认为坚持斗争就会破坏团结，要团结就不能强调斗争。事实却恰恰相反。几乎所有的磨擦事件都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过错引起的。我党我军真诚地希望与友党友军团结一致，共同抗日；而反共顽固派虽然口头上也叫喊要抗日，内心里却总在想着如何削弱以至消灭我党我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放弃斗争，一味退让、妥协，那么，在陕甘宁边区来说，不要说鄜县、甘泉一带，恐怕连延安以至整个边区，都很可能被国民党强占了！那样，党中央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哪里还谈得上团结和抗日统一战线呢！当然，在斗争的时候，我们决不可忘了是为了争取顽固派继续留在统一战线内，共同抗日，而不是同他们争地盘，争高低。八年抗战期间，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和大批特

工人员在陕甘宁边区内外制造的磨擦事件数以千计，但两党两军团结抗日这个大局，终究没有彻底破坏，这不能不是坚决贯彻执行党的“以斗争求团结”这一政策的结果。

三是原则性和灵活性。对于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必须坚持斗争，在任何问题上都不能损害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这是原则性，是无产阶级的党性；但斗争又必须讲究策略，讲究方式。有军事上的斗争，还有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斗争，究竟采用哪种斗争方式，要依具体情况而定。斗争不但要考虑是否有理、有利，还要有节，要掌握分寸，适可而止。这些都需要灵活性。例如在关中，当顽固派惨杀我伤残员兵、强占我枸邑县城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如克制，立即增兵进行武力还击，那就可能大打起来，一打就不可收拾，整个边区的安全会受到严重威胁，抗日统一战线这个大局也会遭到破坏。我们忍让了一下，虽然受了点损失，却维护了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在陇东的反磨擦斗争中，我们就更加重视了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顽固派对我宁县、镇原等县城，两次发动武装进攻，我们不但针锋相对地进行了还击，而且审时度势，两次主动提出派代表进行谈判，同时展开了强大的宣传攻势。顽固派虽然侵占了我两座县城，在政治上却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推卸不掉制造磨擦的罪责，在全国人民面前输了理。